

日本华侨研究

陈昌福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曹宝生

日本华侨研究

陈昌福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常熟赵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 字数 13.5 万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15-449-K·59

定价 3.00 元

目 录

一、古代日本的中国移民问题.....	[1]
二、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	[23]
三、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函馆华侨社会的兴衰.....	[42]
四、孙中山和日本华侨.....	[55]
五、“七七”事变后的旅日华侨.....	[86]
六、从战后横滨中华街的变迁看旅日华侨的经济开发.....	[100]
七、旅日华侨的历史和现状.....	[122]
附录 一、徐福东渡史事杂考.....	[149]
二、宋代华侨述略.....	[158]
后记.....	[179]

古代日本的中国移民问题

历史上，中国人民为避战乱，曾迁徙到朝鲜半岛，有些人又辗转到了日本，日本史书上称他们为“归化人”。归化人主要是指中国移民，但也包括一部分古代的朝鲜移民。他们移居日本是为了寻觅安居之所，也有的是受招聘或是被迫而去日本的。他们的文化程度和生产技术水平，远较当时的日本为高，用“归化”两字实有欠妥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有些史学家改用“渡来人”来代替“归化人”的称谓，这比较符合实际。

古代中国人民的移居活动，是早期中日民间往来的一条重要渠道，它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接触和了解，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沟通了两国政府间正式的政治、经济交往，从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中日关系的发展给以强烈影响。

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在航海和造船技术十分落后的远古时期，中国人民就利用日本海的环流路这一条最古老的航路前往日本。无论是中国史籍还是后来的日本史籍，都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纪录。

《史记》中，徐福泛海东渡一事，可谓我国最早一次有计划的集团移民的记载。

日本史籍中关于最早一批中国移民的明确记载，始于《日本书纪·神功皇后纪》日本摄政五(205)年。这一年，新罗为了取回人质，遣使日本。由于新罗使者用计使人质逃归新罗，葛城袭津彦“乃诣新罗，次于蹈鞬津，拔草罗城还之。是时俘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宫、忍海凡四邑汉人等之始祖也”。蹈鞬是脚踏的皮风箱，一般用于冶炼。蹈鞬津可能是冶炼金属的手工业较集中的地方。被虏掠到日本的汉人，估计原先是移居在朝鲜的中国冶金手工业者，其人数虽然不详，但从他们及其后裔分布于大和地区的四邑来看，当不在少数。

中国人大量移居日本是在公元3世纪末至5世纪，即自大和国崛起至统一日本列岛止，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和政权对内建立以大王为中心的中央地方贵族的统治；对外与中国密切交往，尽力吸收大陆文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就在这个时期里大举渡海移民日本。从应神天皇时期^①开始，日本畅开门户，欢迎这些中国移民在日本落籍。而这一时期的中国，自汉末三国以来长期陷于兵燹战乱，一些劳动人民为了摆脱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纷纷被迫离开内地向边缘地区移居，其中一部分移居东北，并由东北移向朝鲜半岛，再进一步移居日本列岛，因而在日本史籍中留下不少有关中国移民的记载。

《日本书纪·应神纪》应神十四(283)年条载：“是岁，弓月君自百济来归。因以奏之曰：臣领己国之人夫百二十县而归化，然新罗人之拒，皆留加罗国。爰遣葛城袭津彦，而召弓月之人夫于加罗，然经三年而袭津彦不来焉”。十六(285)年条又载，“八月，遣平群木菟宿祢，的户田宿祢于加罗，仍授精兵诏之曰：袭津彦久之不还，必由新罗之拒而滞之。汝等急往之击新罗，披其道路。于是，木菟宿祢等进精兵，莅

于新罗之境。新罗王愕之服其罪。乃率弓月之人夫，与袭津彦共来焉。”从这一记载中，应神天皇对于中国移民是极力欢迎的，特地派出葛城袭津彦，继之又派出平群木菟宿祢等率领精兵，讨伐新罗，为中国移民来日开辟道路。弓月君这支移民达一百二十县，这里的一百二十县也许不是指行政区划的县，而是一百二十个村社或氏族集团。《日本书纪》并未指弓月君是秦氏之祖，而在《古语拾遗》中记载有：“秦公祖弓月，率百二十县民归化矣。”弓月君自称为秦始皇之后裔（《姓氏录》作五世孙，《三代实录》作十三世孙），日人把这一支移民称为“秦人”。

继秦人之后来到日本的为“汉人”。《日本书纪·应神纪》应神二十（289）年条载：“秋九月，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据阿知使主的后代、坂上划田麻吕在日本延历四（785）年上天皇的奏文中说他的祖先是汉灵帝的曾孙，“人民男女皆有才艺”，于汉祚迁魏之际，经由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②这一支移民日人称为“汉人”。

到了公元5世纪，又有一支被称为“新汉人”的移民集团从百济移居日本。他们都是一些应大和政权之聘的工匠。关于他们的情况，《日本书纪·雄略纪》雄略七（463）年是这样的说的：“是岁……于是西汉才伎欢因知利在侧，乃进而奏曰：巧于奴者，多在韩国，可召而使。天皇诏群臣曰：然则宜以欢因知利副弟君等取道于百济；并下敕书，令献巧者。”这些工匠来到日本后，“天皇诏大伴大连室屋，命东汉直掬以新汉陶部高贵、鞍部坚贵、画部因斯罗我、锦部定安那锦、译语印安那等，迁居于上桃原、下桃原、真神原三所。（或本云：吉备臣弟君还自百济，献汉手人部、衣缝部、穴人部。）”括号前的引

文是通行本《日本书纪》的记载,所说的陶部等五个部(有关部的问题本文将在以下部分说明)都是有生产技术的手工业者,译语部显然是指有文化知识的移民,引文仅列举各部领袖的名字如陶部高贵,鞍部坚贵等,实际上每个部都是从事某一种手工业的技术劳动者集团;括号内的引文则是另一版本的《日本书纪》,所列举的只有汉手人、衣缝、穴人等三部。“穴人部”也叫“害人部”,是烹调肉类的劳动者集团。由于穴人部及汉人移民的增多,日本人的食物范围逐渐扩大,烹调方法也可能有了某种改善。日本史籍中为同前于他们移居日本的归化汉人相区别,便称他们为“新汉”,意即新来的汉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大和国的高市郡。高市郡因此称为“今来郡”^③。

除了集团性的群体移民外,个别家族渡来日本的人数也不少。例如第一个在日本传播汉字和儒学的王仁。《日本书纪·应神纪》应神十五(284)年条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伎贡良马二匹。即养于轻坂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曰厩坂也。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向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条又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王仁在《古事记》中作“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来到日本。日本初无文字,仅九州与大陆交通之便,有人略识汉字,自王仁始,汉字便传入日本了。从上述引文看,一般咸认为王仁为朝鲜人,其实不然。王仁曾在自述中明白地说过:其“先为王鸾,鸾之后为王狗,原为汉高祖刘邦之后裔,至百济始易姓”^④。

古代日本的中国移民中，也有从中国大陆应聘直接渡来的。《日本书纪·应神纪》应神三十七(306)年条载：“春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⑤，令求缝工。……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四十一年条又载：“二月……阿知使主自吴至筑紫。……既而率其三妇女以至津国……。是女人等之后，今吴衣缝、蚊屋衣缝是也”。木宫泰彦认为此事本属《雄略纪》中的记载，是错乱混入《应神纪》的。《日本书纪·雄略纪》的记载是：“十二(468)年四月己卯，身狭村主青与桧隈^⑥民使博德出使于吴”。“十四年正月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国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吴津。是月，为吴客道，通矶齿津路，名吴坂。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媛，奉三大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汉织、吴织衣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之先也。”当时，日本的衣服式样极为简陋：取布一幅，中穿一洞，贯头其中即为衣(《魏志·倭人传》)。雄略天皇竭力提倡仿效中国衣着，一直把实现“朝野衣冠鲜丽”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之一，所以对于中国的织、缝两工来日极为重视，不仅把安置吴工的住所命名为吴原，而且组成衣缝部命弟媛掌管之，促使衣缝工艺发展，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飞鸟衣缝部和伊势衣缝部。

先后几批集团或零星的中国移民渡来，便在古代日本社会中形成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掌握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而且人数众多。虽然难期有确切的数字可以说明他们究竟有多少人。但据后来的一些纪录上说，雄略天皇时期(457—479年)，秦人在京畿中有91部共18670人。钦明天皇元(540)年秦人户数达7053户。若以一家五口估算钦明朝时单秦人一支移民就在35000人以上，加上其他的中国移民，总

数当在 10 万以上。《古语拾遗》上说：“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若按大化革新后全国户籍以 50 户为一乡的建制作基准类推，钦明朝时秦人移民可得 141 乡之数，把它与二百年后奈良朝(710—794年)初期日本总共 4012 乡之数相比，秦人竟占 1/28。如上溯以钦明朝同期相比，其所占比例自当更大。这样，则钦明朝时中国移民人口占日本总人口之数以 1/20 估算也不为过。到了 9 世纪，根据《姓氏录》^① 所载，居住在京畿、山城、大和、摄津、河内、和泉等地区，列于统治集团的 1059 氏(一说 1182)中，有 324 氏是外来移民，约占总数 30%。这些外来移民虽然不全是中国人，但中国移民的比例一定不会太小。

6 世纪中以后，中国人自中国大陆或经由朝鲜半岛向日本列岛大规模移居活动告一段落。当时，中国隋、唐帝国相继建立，结束了魏晋以来长期战乱不止的动荡局面；同时，由于高句丽兴起，经由朝鲜半岛的交通时常梗阻；而日本经历大化革新及律令制的确立，已不满足于通过中国移民来吸收中国文化，而是更需要自主地派遣留学人员直接来到中国学习。如以大化革新为界，嗣后近千年的岁月里，虽然历代仍有中国移民继续移居日本，但数量不多，且不如以往那样地深入普遍了！

二、

在以农耕为社会经济中心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因求谋食和避祸而导致人口移动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然而，古代中国人民向日本的移居活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特点。

在小农经济的安土重迁观念的支配下，劳动人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背井离乡。历史上由于天灾或人口增长与耕田不足的矛盾常常会引起大批农业劳动人口为谋食而远走他乡。但是这种人口迁移在空间上大致是以能安身立命或达到温饱程度作为一个限度；若是由于人祸、战乱或不堪忍受虐政压迫之故，那么这种迁移，总是越远越好，以力所能及的地方作为空间的极限。古代日本的中国移民就是属于后者。

古代中国战祸频仍。公元前3世纪左右，中国正是经历战国而归于秦统一之时，连绵不断的战乱，迫使中国人民离开内地向边缘地区移居。同时，这一时期里中国的农业已由早期的不成熟的向传统的成熟的小农业过渡，由粗耕向精耕的个体小农经济跃进。古代中国农业生产力发生的这一变化为这种移居活动提供物质条件，也决定这一移动轨迹的缓慢而持续的特点。

燕为战国七雄之一，地处中国的东北边区。它的兴起正是以多数内地移民流向东北边区作为凭借的。燕昭王时，秦开征服东胡族后，燕的势力范围自朝鲜半岛南下直至清川江一带，于是有关朝鲜半岛南部以及日本的知识开始传入国内。《山海经》所谓：“倭属燕”当非虚构之词。燕亡于秦，移民回归内地之路断绝，于是分批流入日本自为势所必然。秦并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范围扩大，控制力量加强，出于躲避秦朝虐政这一目的，就必须远离其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日本列岛孤立于海洋之中，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民情淳朴，自然成为移民们向望的隐遁之所。他们从自身要求摆脱剥削和压迫的愿望出发，把正在或已经形成国家但尚残留大量原始社会痕迹的日本幻想为“蓬莱仙境”（中国古籍

中也有称日本为“蓬莱国”、“君子国”)。公元前108年,汉置四郡,势力达到朝鲜半岛南部。汉亡之后,中国陷于两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和割据之中,一批已经由内地移居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便再迁移至日本。以铁制工具为主的中国文明也就在朝鲜半岛汇同并追越殷商以来传入的青铜文化之后,便随同他们迅速传至日本列岛。

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常常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古代中国人民为了避祸和求生存而不畏惊涛骇浪越海东渡,在当时船舶和航海技术还是十分幼稚的情况下,该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勇气和智慧去进行探索和开拓。这种从古代中国移民中已经显露出来的探索和开拓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性格中的本质特征,它是我们民族发展和社会前进的动力。随着中国人民的移居,也把这种民族性格增添到日本民族中去,成为日本民族兴旺发达的源泉之一。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在感叹“道不行”时也曾向往海外,有过“乘桴浮于海”的念头。孔子出了鲁国,渡海向东最大的去处,只有日本列岛。孔子是否打算东渡扶桑,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他的这种心情正是这些移民的心情。当时在他们的头脑中,“落叶归根”不愿“葬身异域”做“冷魂野鬼”的传统观念还未根深蒂固。他们的移居日本是由于祖国的战祸、苛政而被迫远涉重洋的。中国移民以其知识和技术的优势和日本人民一道共同开拓和建设日本列岛。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后来由从事经济活动而参与了日本的政治,成为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而取得了相应的政治特权,但从来不是作为征服者或是殖民统治者来到日本,他们移居日本属和平性质。

古代中国人民移居日本,不是靠政府作后盾,而是靠移民自身的群体力量。在小农经济的物质条件下,远涉重洋,命

运难卜；处身异域，筚路蓝缕，靠的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集体。这些中国移民在解决衣、食、住、行以及在和日本人民相处与交往中，血缘观念更其成为一种凝聚力和粘合剂。血浓于水，他们都自称为秦皇汉武之后，与其说是为了炫耀身世，毋宁说是血缘凝聚力的人性化和“炎黄子孙”的具体化。他们常常通过对于共同祖先的回忆和追述，不断强化共同血缘的观念。王仁的祖先从中国辗转迁徙至百济，并已易姓，传至王仁已有400年了，但王仁渡日后，犹能清楚地自述其祖先“原为汉高祖刘邦之后裔。”785年坂上刘田麻吕在给天皇的奏章中追述他的在300年前归化日本的祖先，原是距他1000年前的汉灵帝曾孙的后裔。历经千百年之后，在异国依然能道出自己家系渊源，显而易见，其价值不在夸耀过去，而是适应现实。他们还建造中国式的寺庙，把共同的血缘观念升华为对共同祖先崇拜的信仰。平安时期，京都四周的许多神社如：贺茂、松尾、稻荷等以及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广隆寺就是基于这种需要而建造起来的。这些寺庙从根本上说乃是中国移民的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状态的凝固化。诚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自然同化过程的进展以及大化革新后律令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确立，中国移民这种共同血缘观念也就逐渐趋于淡化了。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是以家族关系为核心，定居在一定的地区内。608年，隋使裴世清到了日本后，途径“秦王国”，见“其人同于华夏”（《隋书·倭国传》）。据《姓氏录》记载，仁德天皇曾称弓月君的一支移民为“秦王”。由此推测这个“秦王国”可能就是这一支秦人后裔。从畿内迁居到今福冈县一带，秦人尚能聚居在同一地区里，俨然成为“秦王国”，其人依然还能保持华夏风貌，足见血缘观念所能产生的

内聚力的强大，它使这些移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能保持本民族的重要特征。他如桑原、佐藤、高官、忍海四邑，亦系中国移民自成聚族而居之地，相沿成习。这种聚族而居之地，其实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村落制度在异国的土地上形成一种有别于当地人民的具有域外特征的移民居住区。只是随着空间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原来较为单纯的家族邻里关系，已经为较复杂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所代替罢了。

共同的血缘、对共同祖先的崇拜以及具有域外特征的移民居住区环境，培育了中国移民后裔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他们眷念着哺育过他们祖先的故土，并使他们常常为之魂牵梦萦，希望有朝一日能踏上这块令人向往不已的土地去看个究竟。正是这种浓厚的乡土之情，这一层海外的血缘关系，才使他们甘冒险恶风浪在两国政府之间梁起一座友谊的桥梁或是随同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到中国，去学习和研究久已隔绝的中国文化。608年随裴世清来到中国的8名留学人员无一不是中国移民后裔，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熟悉汉语的缘故吧。

中国移民尽管聚族而居，但没有也不可能与日本社会隔绝。他们热爱哺育过他们的故土，也同样热爱业已生根的异国。他们移居日本的目的原是为了追求生活的安宁，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是暂时的逗留而有久居之意。他们和日本人民世代生活在一起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经济上紧密合作，在生活中密切交往，以及通过婚姻结合形成亲戚关系等一系列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开始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逐步走向自然同化。只是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里，民族融合的过程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一过程才显得持久、自然、全面而又深刻，使得这些移民是

作为整体汇合同化，不是作为少数民族而继续存在在日本社会之中。今天我们虽然可以追溯到日本民族中，“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了百分之十或二十古代归化人的血液”^⑧、中日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缘关系，外貌又颇相似，日本文中也借用不少汉字等等，但是，决不能据此认为中日两国“同种同文”。表面上的“同”固能产生一种亲近感，容易接近，然而只有同时注意到相互之间的“异”，进而研究切磋，才能增强彼此的认识和理解。这样虽非同种亦同相亲，才能有利于两国，亦有利于世界和平。

人们在生产进程的交往是任何一种交往的基础。中国移民在古代日本社会中所从事的物质生产乃是中国移民和日本人民交往的基础，也是中国移民生存于日本社会的全部基础。在古代日本，中国移民的主体是一些来自封建社会的具有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和具有一定生产技艺的劳动者。对于日本来说，如何控制这些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国移民，便成为大和政权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若是采用集团性的奴隶劳动，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大和政权尚无力改变这些移民的身份和地位，对他们实行奴隶制剥削；若是采用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这对于封建因素还未有所发展的大和政权来说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大和政权把生活在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下的中国移民，按其所从事的某种生产或专长，以“部”的形式组织起来。“部”这种组织形式，最早是与祭祀有关。中国移民大批来到日本后，大和政权把他们编为部民以确定其隶属关系；把他们“安置国郡，编贯户籍”^⑨集团地定居下来以世代保存其技术，同时把部扩展到军需和贵族日常生活有关的各生产部门，形成“部民制”。由于以部民制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大和政权得到了统一和统治全国的物

质力量。随着大和统一日本列岛，部民制又进一步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和所有的生产领域。

由中国移民组成的部大别为两类。一类是抄录官事、勘署文案、申读公文的史部和收藏、出纳国库物资、主管财政的藏部。史部和藏部是以中国移民中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他们以其文化知识、擅长文笔供职于大和政权，受到朝廷重视，并被授予田地和部民作为俸禄，日后与日本统治阶级合流，这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部或者说它是部民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的发展。另一类是从事农耕劳作、治水辟田的田部和为各级贵族生产除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以外的吃、穿、用、住、娱乐品的品部，如锦部（织工）、衣缝部（缝工）、陶部（制陶）、鞍部（制马鞍）等等。品部多定居在畿内及其附近，归朝廷直接管理，一般是从他们中间选择才艺出众者作为部首具体负责。田部和品部的部民必须定期或根据需要向朝廷贡纳产品或服劳役，在这一前提下，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自己生产维持生计的粮食和日常农产品，允许他们彼此婚姻，建立家庭。显然，这种对于部民的剥削已经不是奴隶制的剥削，这些部民的身份已与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隶农相仿。

大和政权通过部民制把中国移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组织起来，确保这些技术能世袭地继承下去，从而缩短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中国移民大批来到日本，促使日本部民制的迅速发展，而自大化革新以后，由于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已经直接沟通，部民制才于676年由天武天皇宣布废除。部民制的兴衰不正是中国移民在古代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生动说明吗。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勇于善于吸收先进文化为己所用，才能有力地推进本国或本民族的发展。古代日本虽然落后，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民族对于中国文化有惊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并能充分利用中国移民文化的冲击写出日本社会发展的画卷。

三

古代，从中国向日本的几次人口迁徙浪潮，推动了日本走向兴盛。公元6世纪以前，移居日本的中国移民不仅是一支人数众多的精壮劳动力队伍，而且由于这时的中国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些远离本土的中国人都是带着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而来的，因而移民本身在客观上乃是中国古代文化向日本列岛的输出和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它对当时日本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以极大的影响，给日本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小的推动，并且在沟通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正式交往中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中国移民在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徐福东渡之时，日本尚处在使用新石器工具、以采集经济为主的绳纹文化时代，但自徐福东渡之后，日本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古代先进文明，结合自身已经具备的基础条件，数千年来迟滞不进的绳纹文化一跃而进入开始使用金属工具，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弥生文化时代。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这五百年间的弥生时代可谓是日本历史上变化巨大的时代。弥生时代文化与原有文化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这种质的差异在于它接受由中国大陆传入的水稻耕作和金属工具。水稻耕作的传入使日本迅速脱离长期停滞的狩猎、采集的原始状态；金属工具的传入使日本在短期内直接进入铜铁并用时代，省却了青铜文化的迁缓过程，甚至一举而使铁器

先于铜器而在弥生时代占有重要地位。水稻耕作的迅速发展，使日本最终脱离了原始状态迅速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它的发展结果，便是公元4世纪左右日本列岛上出现为数众多的小国。日本列岛上这种奇迹般突变显然是与徐福东渡带来的“百工技艺”和“五谷种种”直接相关。徐福东渡不仅揭开了2300年里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且对于当时日本社会的影响，其意义不亚于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无怪乎日本人民神化了徐福，尊他为司农耕、医药之神，每年11月28日都要祭祀徐福，崇敬备至。

以弓月君为首的秦人来到日本后，散居在京都盆地西部的松尾、松室一带从事农耕。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同日本人民一道开拓京都盆地，更以他们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熟练的劳动技能，在进行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4世纪初，他们修建了茨田堤和茨田屯仓；建造了丸迹池和依网池；挖掘了难波的堀江，使之入海；又挖小椅江，营造墨江码头^⑩。秦人移民还以当时日本所不可想像的、被誉为“天下无与伦比”的筑堰技术，将葛野川（即桂川、今京都岚山公园一带）之水引入平野，使荒芜的原野顿成沃土。至今葛野川之一部仍被称为大堰川，以纪念秦人建造堤堰，开渠灌溉，开发农田所作出的杰出贡献。^⑪农田的开发，亦即人们对于土地利用范围的扩大，乃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里更为重要。4—5世纪之际，大和政权正是利用中国移民的农业技术劳动，在畿内（京都一带）进行卓有成效的农田开发，才使畿内的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增长，从而强化了大和政权对全国的支配力^⑫。

除农耕而外，秦人在养蚕制丝方面的业绩也很突出，据《古事记》仁德天皇条载，养蚕技术最初是由朝鲜人奴里能美